



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 吴振宇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要以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要求为指南，对标对表，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和及时性。全面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 and 水平。实体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这既源自于实物在居民消费中的核心地位，也源自于实体经济对生活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作用。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脱实向虚、自我循环，既挤占实体经济发展的资源也会累积风险，进而影响经济体系稳健运行。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水平，总量上要采取多种举措控制宏观杠杆率，挤压金融自我循环的空间。结构上要优化融资结构体系，打造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链，要完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体系，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实体经济。监管上要加强各部门的统筹协调，全面建立功能监管和行为

监管框架，强化综合监管。

积极推动金融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驱动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构建普惠性创新金融支持体系，促进经济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我国银行主导的资金配置体系难以适应创新创业型企业融资特点及需求。要以创业板和注册制试点为抓手，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发挥其创新融资支持功能。要积极开展符合创新需求的金融服务，推进高收益债券及股债相结合的融资方式。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要改进服务科技创新的方式，推动投贷联动业务发展，建立健全促进科技创新的信用增进机制。要加快发展科技保险，推进专利保险试点。

加快提升金融服务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主要指各区域、各领域各方面发展不够平衡。要积极发展多种业态的普惠金融组织体系，发挥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互补作用，整合扶贫资源，拓展扶贫开发资金渠道。积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等技术发展金融科技，克服信息不对称、降低金融经营成本，提高城乡居民和中小微企业的金融获得感。要采取多种政策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将金融资源向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倾斜。

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开放，适应开放型经济建设新要求。开放是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宣布了扩大开放的一系列新举措，我国金融业开放进入快车道。面对国际经贸环境的新变化，我国要在维护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扩大银行、保险、证券、养老等市场准入。要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便利对外经济活动。要深化内地与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金融合作。推动建立多元化的全球融资框架，实现我国金融资产全球布局。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金融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按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求，使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在金融管理中的作用。要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提高金融市场运行效率，要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制度和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增强微观金融企业活力。要将五大理念贯穿于金融改革全过程，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



激活“工程师红利”推动高质量发展

□ 曹慧泉

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啃硬骨头，涉险难。改革需要人才、呼唤人才、造就人才。其中，充分激活“工程师红利”，可以为发展科技创新型经济创造有利的人才条件，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

激活“工程师红利”是产业升级必由之路

所谓工程师红利，本质上指复杂劳动者或智力劳动者资源优势。即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中工程师人口数量庞大、所占比例高，为发展科技创新型经济创造的有利人才条件。

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的崛起与地位巩固均伴随“工程师红利”。20世纪80年代前后，硅谷涌现出数以万计的高技术企业，工程师人才的区域性富集起到决定性作用。德国、日本在二战中劳动力人口大幅减少，二战后制造业能够快速恢复和发展，战后大规模工程师人才培养战略，是重要基础和推动力量。联邦德国1950—1970年每万居民大学生数从21人增加到67.9人。日本1960—197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0.3%上升到38.4%，2017年达到80.6%。工程师队伍为其制造业腾飞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相反，巴西、阿根廷人口红利和资源均非常丰富，但是，巴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阿根廷毛入学率为21%，但学位完成率分别只有20%、30%，难以满足产业提质升级对人力资源的需求，是导致他们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产业发展看，中国正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持续扩大，自2010年起稳居全球第一，2018年全国工业增加值超过30万亿元。其中，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的工业品超过220种，卫星技术及应用、5G技术及应用、超级计算机、

除了众所周知的世界500强企业，全球最优秀的企业更多的是占据诸多细分领域绝对领先地位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几乎主宰着各自所在的细分市场领域，他们占有着很高的市场份额，有着独特的竞争策略，往往在某一个细分的市场上进行着专心致志的耕耘。尽管规模小、资源有限，但是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却令人瞩目。他们因掌握行业关键知识和技能的核心技术、关键部件或关键材料，享有其他企业无法替代的优越地位，是具体产业命运的真正控制者。

1974年经济学家舒马赫出版了关于中小企业的论著《小的就是好的》，从经济学理论上说明了小企业发展的独特优势。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管理学家逐渐意识

工程机械、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等形成“蛙跳效应”，已经走到世界前列。但面对美国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遏制和打击，构建以制造业为核心的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现代产业经济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应对这一挑战，既要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加大投入，更要发挥中国已经初步形成的庞大工程师队伍优势，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成长。

从人力资源供给看，“人口红利”已近尾声，“工程师红利”初现。当前“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前一个“难”，是普工难招，后一个“难”，是大学生就业难。两难背后体现的是人力资源供给的深刻变化。2018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万元，扣除物价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20多倍，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60%以上降低到28.4%，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城乡居民整体达到小康水平，超过4亿人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低成本农民工的来源大幅压缩。过去10年，我国培养了6500万左右的本科以上学历高素质人才。2018年，我国拥有普通高等院校2663所，另有研究生培养单位815个，各种形式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3883万人，规模居世界第一位。高等院校毛入学率48.1%。包括海外留学回国人员在内，全球规模最大的工程师团队已经在中国形成。

从技术演进看，当前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成为主流，同时带动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升级。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是我国制造业提质升级的根本路径，也是未来制造业生产经营的基本组织形式。产业升级后带来高度技术化、高度集成化、高度智能化的领域，劳动复杂性呈几何级数递增，只有具备智力劳动能力的劳动者才能承担。简单劳动和体力劳动被智能化机器化大规模替代已是大势所趋。2017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全年累计销售141万台，汽车、电子、加工装配、运输仓储等已经处于机器换人的高峰。未来就业岗位，将

主要提供给具有工程师及其同等智力劳动能力的劳动者。

释放“工程师红利”中国已经具备一定条件

持续的技术投入与开发进入收获期。据测算，2005—2015年，全国大中型高新技术产业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0%。2018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9657亿元。2018年，中国提交专利合作条约（PTC）的国际专利申请53345件、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体系69000件，均居世界第二。提交专利合作条约（PTC）申请前十名企业中，中国占3家（华为、京东方、中兴），华为以5405件申请量居第1位。科技论文数量加权评分、国际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名均居世界第2位。“神九”、“蛟龙”、航母、“北斗”等一大批尖端科技产品纷纷亮相，在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领域也已经出现一批领先成果。

资源要素配置体系基本形成。2005年—2015年，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增长47倍，大学科技园增长23倍。2018年，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达到4894家、大学科技园超过200个。根据行业咨询机构Crunchbase发布的数据，2018年1—10月，中国风险投资的总额达到938亿美元，比美国916亿美元风投规模高22亿美元，居全球第1位。2019年6月1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正式开板并实施注册制，资源要素配置体系更加完善。

具有旺盛的国内市场需求支撑。随着脱贫攻坚逐步取得决定性成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加快实现，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内市场需求已经进入加快向中高端发展，市场消费能力大幅提升。2018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8.1万亿元，按照平均汇率计算，约为5.7万亿美元，增长为9.0%。其中城乡居民个人消费费达到246万亿元，消费品总额5.53万亿元，增长10.1%。中国的大市场优势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隐形冠军”

相关数据显示，全世界3000多家隐形冠军公司，德国拥有1307家，数量最多。而我国虽然是世界制造大国，在很多产业规模也做到世界前茅，但这些产业很多大而不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特殊材料却大都垄断在国外“隐形冠军”企业手中。大到精密机床、半导体加工设备、飞机发动机和汽车发动机，小到圆珠笔笔尖的球珠、高铁列车上的螺丝钉、电子产业的高档芯片、微电子链接用的导电金球，等

等。“隐形冠军”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中国能否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跨越。中国的产业要由大变强、拥有话语权，就需要更多的“隐形冠军”企业，专注解决产业关键技术、核心部件和特殊材料，在细分市场的高度专业化、致力于客户服务以及适应性技术的不断创新。向上延伸产业链，培育价值链上的隐形冠军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紧迫目标。（毛 强）

向往所创造的需求升级，为释放“工程师红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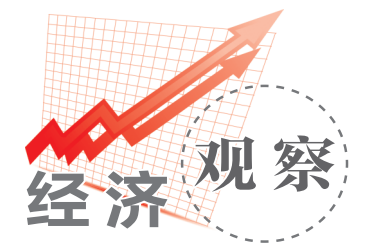
挖掘和释放“工程师红利”的对策建议

大力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从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政策链融合的高度，重视挖掘和释放“工程师红利”，是适应中国市场升级、技术升级、产业升级，与时俱进推动新时代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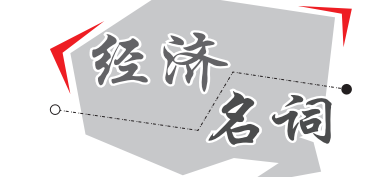
引导企业走专精特新之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企业是市场主体，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落脚点始终在企业。要创造条件鼓励企业从依靠规模低成本竞争之路转换到走创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争当单项冠军、隐形冠军。

集中力量攻克核心技术难关。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关系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高精尖领域组织开展重大项目攻关和关系产业供应链安全的关键核心技术组织揭榜挂帅，集中突破。进一步完善国家顶级科研团队与企业各层次工程技术人员联合参与、融合共生、收益合理分配的运行机制，锤炼工程师团队攻坚克难的本领。

深化改革清除体制机制障碍，优化资源配置。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以产业政策为抓手，大力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化，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形成更加灵活、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的分配体制，调动积极性，激活“工程师红利”。



等。“隐形冠军”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中国能否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跨越。中国的产业要由大变强、拥有话语权，就需要更多的“隐形冠军”企业，专注解决产业关键技术、核心部件和特殊材料，在细分市场的高度专业化、致力于客户服务以及适应性技术的不断创新。向上延伸产业链，培育价值链上的隐形冠军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紧迫目标。（毛 强）



（上接1版）

理念为先。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融合发展首先要转变理念。要站在“国家层面”，从适应国家需求的战略高度，思考对外传播融合发展的出发点和实现路径。要有“全球视野”，置身国际大舞台，把对外传播融合发展放在与国际主流媒体竞争和国际传播能力的提高中去把握。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善于用开放、平等、共享、互动的核心观念指导对外传播实践，让受众积极主动地深度参与传播内容生产。要坚持“协同合作”，充分挖掘现有资源，增强联合作战能力，整合各方特长和优势，实现1+1>2的效用。要坚持“效果导向”，深刻认识到，评价对外传播工作归根结底看效果，没有效果就没有意义，一切形式、内容、渠道等都要服从服务于效果。

内容为王。内容是传播的基石和灵魂。对外传播的总体目标是对外介绍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让国际社会、国外受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展示良好的国家形象。传播内容上，首先要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讲好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讲好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故事，讲好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的故事。要着眼于增强中国文化影响力，既宣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传播中国优秀当代文化，展示中国人的精彩生活，推动反映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价值理念、文艺精品、文化成果走向海外。

机制为体。运行有效的工作机制是支撑融合发展的骨骼与经络。可以从三个层面，按照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原则，探索建立符合融合发展需要的内外协调合作的机制体系。首先，各媒体单位自身建立健全一套适合融合发展的业务流程，形成传播产品采、编、译的流水线。其次，加强统筹协调，发挥不同媒体、各个单位的优势，统筹内容采编、发布渠道、效果评估、信息反馈，构建升级版的“中央厨房”运行机制。再次，加强对外合作，深化与中央部委、国有企业、地方政府、高等院校、研究组织乃至境外机构等多方面的合作，把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内容通过我们的渠道优势广泛迅速传播出去。

技术为基。新技术带来从理念到主体、从内容到方式、从体系到管理的全方位改变，是推进融合发展的基础因素。一方面，要加强传播技术应用，将先进技术应用到传播内容采集制作全过程，构建全媒体传播平台，

丰富表现形式，发挥技术在提高传播分众化、精准化水平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主动加强传播技术研究，通过与高科技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等联合建立研究中心等方式，结合自身传播特点和需求，加强对新兴媒体规律和前沿领域趋势的研究，站在对外传播与技术应用融合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上。

人才为要。实现对外传播融合发展，归根到底要靠人，靠人来推动、来落实。建设一流外宣机构，需要打造一支一流的外宣队伍，要通过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工作为抓手，着力提高外宣人才队伍的6种能力：一是政治能力，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坚守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二是专业能力，努力拓宽国际视野、增强业务本领，善于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以过硬作风、创新思路解决突出问题。三是服务支撑能力，围绕中央重要外宣需求和重大外宣任务，拓宽服务领域，做深做实服务任务。四是研究能力，强化外宣智库研究职能，围绕业务进行精细化、分众化研究，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提升行业影响力。五是技术能力，实施技术应

用重大项目，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外宣效果。六是经营能力，大力拓展新型业态，创新盈利模式，主动开拓市场，提高经营质量和效益。

融合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方法、路径，对外传播的融合发展最终是为了达到“融活”的效果

融合发展的内涵在不断深化丰富，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融合来实现“融活”，达到提升对外传播效果的目的。这需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服务国家需求有贡献度。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多语种、多载体传播到全世界。围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课题，配合国家领导人出访、出席重要会议和国际论坛、举办重大外事活动，开展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新闻宣传、文化交流、对话合作，展示中国形象，引导国际舆论，助力国家外交大局。

打造主业精品有影响力。强化品牌意识，提升统一品牌的整体策划能力，围绕对外传播主业，分类推出长期可持续的、更多更响亮的金字招

牌。抓好“中国3分钟”“第3只眼看中国”“聚焦中国”等现有品牌的推广，围绕“人民中国”“辉煌中国”“大美中国”等主题，形成多语种专题报道、图书、音视频等多业态系列品牌，利用品牌效应提升对外传播的影响力。

讲好中国故事有传播力。把讲好中国故事作为对外传播的基本方法，作为提高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基本途径，苦练内功、讲究效果，围绕中国精彩的主题、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贴近中国实际、贴近国际关切、贴近国外受众，用外国人听得懂、易接受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把中国的政策主张、道路方向、改革实践、科技进步、文化成果润物无声地展示在世界面前。

各方协作联动有新机制。对内协作着力实现内涵发展、提升质量，加强内部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形成集约化、规模化、集团化效应。对外协作着力丰富传播渠道、开拓领域，拓展合作平台，与国际的媒体智库等广泛合作，与国内的外宣、教育、科技、文化系统加强合作，形成各方联动、协调合作、互利共赢的工作机制，开创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应用技术创新有时代感。加强对前沿科技的学习掌握及运用，大力推

进语言技术研究，建设全媒体工作平台、智能媒体应用平台，打造外宣大数据智能服务平台和国家级人工智能翻译平台，将人工智能应用于舆情收集、选题策划、内容生产、翻译和传播效果评估中。利用新技术创新对外传播业态，运用5G传输技术丰富传播形式、提升传播效率，促进内容与技术相互支撑、内容与渠道有机结合，给传统内容资源带来新附加值，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时代感和感染力。

推动改革发展有新格局。聚焦“三重”创新发展，打造覆盖全球的区域传播中心，实现对外传播的全球格局。以加强翻译人才队伍建设为突破口，着力提升国家语言能力，构筑融通中外、面向世界的对外话语体系。强化战略性思考、系统性谋划、创造性操作，努力取得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打造世界一流的、具有强大综合实力的国际传播机构，为对外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为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作出新贡献。

（作者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